

DOI:10.13718/j.cnki.xdsk.2015.03.016

[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武侠小说由“武侠”和“小说”二者结构而成:武侠小说一方面是“武侠”,这里包含着一种基于文化心态的历史源流,由此可以看到武侠文化的历史心态及其生成与变迁;武侠小说在另一方面是“小说”,则以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叙事方式,彰显着与叙事相应的独特武侠文化魅力。本期栏目刊出两篇文章,孙金燕和刘卫英都是本刊的老作者了,她们这次从新的角度,分别对武侠小说之“小说”和“武侠”的某些方面进行细读,从一个具体入微的角度进行阐释。孙金燕围绕平江不肖生的个案进行探讨,指出武侠小说一直在“纪实”与“求虚”之间挣扎,并由此形成了“武侠文本叙述中分裂的符号自我”,这也就是武侠小说文本的隐性叙事或隐性逻辑。孙金燕的论述,对于认识武侠小说的文类特性,显然是有所助益的,也可以厘清对武侠小说过于偏颇的一些苛求之见。刘卫英仍然从文学母题的角度切入,她曾经在本刊发表过“由爱生恨”的母题史研究论文,这一次她切入的是“矮将英雄”形象,个子矮,性格有缺陷,但仍然不失其为侠义英雄,这在侠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狂欢化的文学建构,尤其是在明清侠文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学与文化资源。从古代的游侠叙事到当下的武侠小说,中国侠文学不绝如缕,也正是因为有了源远流长的时间流脉与丰厚博大的空间延展,并进而在实存与虚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武侠小说才会历久常新,才人辈出,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拥有着众多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重要文类。

纪实与求虚:武侠文本中分裂的符号自我

——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解析对象

孙金燕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讲述最离奇的故事,却打着史传“纪实”的旗号,是20世纪武侠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最主要的文本特性。而在虚构性与历史性的微妙平衡中所隐藏的不可规避的矛盾与写作困窘,自中国现代第一部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即已开始。不论是建立侠客谱系,还是以幻想收编史实,都与武侠小说在中国叙事艺术的史传传统压力下完成虚构中“纪实”的假想有关。以“诚实记录”为托词,支撑一个虚构的世界,武侠文本由此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说谎者”。

关键词: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纪实;虚构;符号自我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3-0117-08

一、纪实与虚构:文本意向性与叙述体裁分类

文本表意总有其意向性。文本叙述对他人发挥影响的意向,是符号发送者希望符号接收者回

收稿日期:2014-07-13

作者简介:孙金燕,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项目负责人:赵毅衡;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武侠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研究”(2014Y267),项目负责人:孙金燕。

应的方式,是贯穿说话者——话语——接收者的一种态度。这种品格超出文本,是说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种意向性交流:说者用某种方式表明他发出的文本有某种特性,而接收者愿意以其要求的方式来理解。班维尼斯特对这种文本品格有过说明:“说话者一方面挪用(appropriates)语言的形式机制,用特殊的符号,另一方面使用第二性的程序(secondary procedure)说出他作为说话者的站位。……任何讲述(enunciation),或隐或显地是一种言语行为,它点明了接收者。”^[1]纪实性文本与虚构性文本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文本“话语”本身,还暗含在作为“说话人”的表意意图以及作为“接收者”的站位。

文学文本作为一种虚构化行为,虽然进入文学文本的客观现实必然超越被摹写的原型,而不必分享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但文本话语对客观现实的不同锚定程度,将会从体裁分类、表意指向、解读方式等方面进行不同定位^[2]。汉民族以宏伟的史传叙事文学代替了史诗,理念上的重实际而黜玄想、形式上的春秋笔法与纪传体模式都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叙事形态,即使在幻想虚构中获得自由的武侠小说也不能例外。而对“虚构性”与“历史性”微妙平衡的寻找,则使武侠小说叙述往往呈现出某种矛盾或写作的困窘。

1923年1月,《红杂志》第22期隆重推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随文附录施济群的评论。小说断断续续连载至1926年7月的第86回(今传本第106回),随后由赵苕狂续写。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述与施济群的回后评在共同支撑一个“事实”:这部小说在“纪实性”地为群侠立传。这种叙述方式在其后的武侠小说写作中持续得到回应,也让厘清某些武侠小说是幻想小说还是历史小说的问题,成为武侠小说研究者们经常需要面对的尴尬处境。

这种难以界定的尴尬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

其一,武侠小说对历史的引入,旨在形成一种非具体的抽象历史意识,如吕进、韩云波所说:“武侠小说如果要写历史,必然是‘戏说历史’,与其戏说,还不如从具体的历史中超脱出来,表现一种更为抽象的历史意识,亦即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顾与反思。”^[3]

其二,武侠小说对历史细节的倾心,是导引对虚构故事的解读向真实无限靠拢的主要诱因,如张新军所说:“金庸的小说经常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甚至穿插历史人物乃至引用历史文献,憨厚的主人公总是一下掌握其他高手一生也无法参透的武功,并为数名美女所追求。我们如何计算作者和读者中这种普遍流行的幻想程度?难道这种故事比《窦娥冤》(有超自然因素,即物理不可能世界)更接近历史现实?”^[4]

其三,究竟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难以取舍,如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一经面世,就面临“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的讨论,倪匡的说法颇有趣味:“他写到武侠小说的部分,是完全根据正宗武侠小说的手法来写。……《城邦暴力团》是非常成熟的,他以前的作品没这个风格的!”这等于说《城邦暴力团》“部分”是“武侠小说”且整体是对武侠风格的革新,体现在“它是武侠小说嘛,它主要的情境,人物关系,全部纠缠在近代史上……你一定要接受他这种,又有幻想,又有现实!”陈思和也说:“作者用这样一部‘江湖即现实’的小说,演出了庙堂与江湖之长达几十年的一部恩怨史或者血腥史,来重新书写本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风雨史。”^[5]

既然文本意向是一种贯穿说话者——话语——接收者的态度,也就是说,可以根据文本话语中的分裂元素解读说话者意图及说话者对接受者的功能性期待。诚如现象学所认为,叙述文本背后的主体关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关联方式。胡塞尔将“交互主体性”解释为:“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在本己意识中被认识到的东西来解释陌生意识,利用那些在陌生意识中借助交往而被认识到的东西来为我们自己解释本己意识……我们可以研究意识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关系而对他人意识发挥影响,精神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纯粹意识的相互作用。”^[6]

由此,关于武侠小说是幻想小说还是历史小说之困惑的厘清,就可以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文类之定型化意义的“具有文学基因性质”的典型作品入手进行剖析。有论者指出,虽然“武侠”一词早

就出现,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真正意义上的文类奠基者,则是1923年的平江不肖生。韩云波认为,“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现代武侠的‘江湖’和‘历史’两大基本元素就已经开始奠基”,不肖生同时开启了中国现代武侠的“奇侠”与“义侠”两条创作进路,“奇侠”代表的是以幻想性和形上性为旨归的创作进路,“义侠”代表的是以现实性和历史性为旨归的创作进路。两条进路同时发展,虽互相影响,但其主流是分别形成不同面貌,而均以不肖生为逻辑起点^[7]。在后继的研究中,韩云波再次强调了平江不肖生武侠书写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的阶段性概念,他解释说:“将1932年以来的民国武侠称为‘后不肖生’时代,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创造了20年代武侠高峰的不肖生在1931年后基本停笔,不再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二是整个三四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基本沿袭了不肖生20年代即已形成的两大进路。研究民国武侠,首先在民国武侠整体历程中确定了不肖生这个逻辑基点,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继承与创新的逻辑理路。”^[8]那么,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讨论20世纪武侠小说在虚构与“求实”中的艰难抉择,或许可以有效洞察隐藏在武侠小说文本中分裂的符号“自我”,以及这一“分裂”的产生机制与功能性影响。

二、《江湖奇侠传》“侠客”谱系悖论

小说虚构的世界是由我们的生存世界即真实世界、可能世界甚至不可能世界在“叠合”与差异中编织而成。通过时素、地素、人素的三种“叠合”,叙述文本符号系统编码一个现实与虚拟的叠加态世界,经验现实材料隐现于想象材料中,使可能世界真,或者非真但拟真。因此,“虚构”的程度由“叠合”的程度决定,根据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相对距离,可以对文学虚构世界进行诗意的类型学判断与描绘:现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世界里,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叠合点多,拟真程度强,故有“现实主义”之称;相比之下,幻想小说虚构的世界拟真程度低,往往显得“荒诞不经”。

《江湖奇侠传》在时素、地素的设定中,挑选了现实世界的部分要素,却显然又与“当时”“当地”刻意拉开了距离。

小说写于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的1923年的中国。在文本叙述中,时间设定在前现代的清朝,柳迟父亲柳大成考秀才而不得,朱复等侠客“反清复明”,张汶祥刺马。在地素设定上,从第一回的“长沙小吴门”开始,煞有介事地明确以湖南为核心而辐射开来,然而与长沙小吴门相隔不远的,是一座“隐居山”：“山巅上一颗白果树，十二个人牵手包围，还差二尺来宽，不能相接。粗枝密叶，树下可摆二十桌酒席。席上的人，不至有一个被太阳晒着。因为这树的位置，在山巅最高处，所以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见它和伞盖一般，遮蔽了那山顶。”^[9]上册，第1回，p1 白果树类似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樗，绝妙之处在于，它让“隐居山”从此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有了某种想象中的勾连。对“人素”的处理是问题的重点，《江湖奇侠传》的叙述一直处于幻想与“立传”的摇摆状态，直到终以“写实”而证明了在幻想中“立传”的虚妄。

可以说,这种摇摆是由书写者与评论者共同造成的。施济群在第三回回后评中称:“余初疑为诞,叩之向君,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然则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见,安能谬测天下恢奇事哉?”所谓“非尽向壁虚构”,倒是揭示了所有艺术文本都会征用部分现实世界知识的特征,不肖生所言“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却是将“征用现实世界的部分知识”推进为与现实世界中“湖湘事实”基本叠合的“写实”,目的为显示这是一部有本事可考证的史传作品。

在即将结束连载的小结中,不肖生再次强调:“在下这部义侠传,委实和施耐庵写《水浒传》、曹雪芹写《石头记》的情形不同。《石头记》的范围只在荣、宁二府,《水浒传》的范围只在梁山泊,都是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所以不至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9]下册，第106回，p197 反观施济群第一回回评:“作者欲写许多奇侠,正如一部廿四史”,“写柳迟状貌十分丑陋,而性质又极聪颖;其种种举动,已是一篇奇人小

传”。第九回回评：“下半回在甘瘤子传中，忽尔夹写桂武小传，乃作者行文变化处。”在同一连载文本中，写者与评者俨然意欲联合将这部小说打成一个有本可察的侠之“合传”。

于是，与此前的侠客叙述相比，20世纪武侠小说叙事正式开始了“列传”式的侠客身世谱系建构，侠客自此同时携带宗法血缘关系与师承关系，成为可供辨认的坐标。同时，这些坐标从亲缘或师门中继承来的爱恨情仇与使命，织就了一个元素饱满的“江湖”世界，其谱系结构又反向证明侠客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群，“真实地活过”。

如此叙述的目标或许是诱导读者们相信，武侠小说也是“记史”的一种形式。但最终出现了意外：“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9]下册，第106回，p200}“不高兴”究竟为何？雄心壮志搭建出来的谱系，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在下”闹起了脾气？这就或许要重新从《江湖奇侠传》的结构谈起。

一般认为《江湖奇侠传》160回中，前106回为不肖生所作。前54回为昆仑和崆峒两派奇侠传；第66回至第106回引入方绍德、张汶祥等现实中的人物故事；中间12回过渡，如第66回称：“吕宣良与柳迟明年八月十五日子时在岳麓山云麓宫门外之约，并是这部义侠传的前后一个开合大关键。”^{[9]上册，第66回，p512}在叙述完“张汶祥刺马”之后，转为火烧红莲寺一案草草收尾，随即出现了“不高兴”云云。

“张汶祥刺马”对整部小说颇有意义，作者解释说：

讲到张汶祥的事，因为有刺杀马心儀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就得着了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祥的人，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祥供词的人，才探得了一个究竟。这种情节不照实记出来，一则湮没了可惜，二则在下这部义侠传，非有这一段情节加进去，荒唐诡怪的红莲寺，未免太没来由。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汶祥刺马故事，也得不惮词费。依据在下所探得的，从头至尾写出来，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气。^{[9]下册，第82回，p10}

“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9]下册，第106回，p197}可见，即使奇而不侠是“张汶祥刺马”的特点，依然值得为其抛荒正传，从奇侠谱系中生枝蔓，甚至是调转笔锋，主导因素在“求实”，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从‘无稽’到‘荒诞’”的“遵循的是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的“奇侠”观^[10]。

于是，这使得关于“张汶祥刺马”的叙述，产生了奇特的效力：这一案件“惊天动地”，从政坛到民间都有据可查，是真正的“取材大率湖湘事实”。但张汶祥不是奇侠，他逸出了“江湖奇侠传”的侠客谱系。这样一个由现实世界延伸至小说虚构世界的人物，曾经真正地活过，而关于他的叙述越“真实”，越不得不写进小说以证小说“求实”，也就越反击了各位“奇侠小传”谱系的不靠谱，以至产生未曾“活过”的不真实感。

“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是因为纪实最终摧毁了幻想中的“立传”，这或许是作者一开始未曾预料到的。但它恰恰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假想：“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虽然反证了“立传”以求实的荒诞，但它作为奇侠江湖的一个枝节，显示了《江湖奇侠传》在更大的范围内以幻想收编史实的企图；如果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是由各人物、事件谱系构成的无数个“可能世界”组成，那史实所在的“可能世界”便是其中之一，这个企图在接下来其他的武侠小说写作者的虚构中仍在继续。

三、20世纪武侠小说“纪实”的隐性逻辑

在《江湖奇侠传》中显现的两种“写实”叙述形式，在后继的武侠小说中得到延伸。不论是建立

侠客谱系还是以幻想收编史实,都与武侠小说在中国叙事艺术的史传传统压力下完成虚构“纪实”的假想有关。

(一) 侠客谱系的延续

在《江湖奇侠传》中,昆仑派与崆峒派诸侠客“小传”穿插进行,形成彼此维系的结构力量。这种系谱结构延续下来,作家往往在多部作品中共同建构一套谱系。还珠楼主以《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武当异人传》等构成“蜀山剑侠”谱系;郑证因以《鹰爪王》《天南逸叟》《子母离魂圈》《五凤朝阳》《淮上风云》等构成“鹰爪王”谱系;王度庐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构成“鹤一铁”江湖悲剧侠情谱系……。侠客们通过三套关系,串联承继而成谱系:

其一,师承教养关系。正式拜师入派,使少林、武当、峨眉等成为武侠小说中人才济济的门派,还有诸如以某个人物为串联的隐性师承关系,如金庸笔下“独孤求败”一脉,在《神雕侠侣》中,独孤求败的大雕伙伴,耳濡目染独孤求败的习武经历,以此教授杨过,杨过间接成为独孤求败的传人;在《笑傲江湖》中,教授风清扬“独孤九剑”,后由风清扬传授令狐冲。“独孤求败”这个从未正式露面的“奇侠”,使杨过与令狐冲所处的“江湖”,勾连成为一个谱系。

其二,血缘伦理承继。王度庐《藏龙卧虎》与《铁骑银瓶》,前者以玉娇龙、罗小虎之间的爱情纠葛为线,后者始于玉娇龙、罗小虎分手十月之后,其子韩铁芳出生之时,小说以韩铁芳寻母、罗小虎寻妻为线索,以侠客亲仇而构成谱系。

其三,侠的“然诺”与武的境界构成。包括侠客的情感盟约与理想抱负。任我行称“江湖中最佩服之人有三个半”、百晓生的“兵器谱”等,以绰号和排名的方式来实现对侠客之“武”与“侠”的认同。它与师承、血缘中承继过来的“报恩仇”关系,构成了江湖谱系的重要元素。

更为重要的是,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往往尝试共有一套谱系。如昆仑、崆峒、丐帮等平江不肖生的谱系结构节点,以后又重现于金庸等作家的多部武侠小说中;武当、青城等还珠楼主的谱系结构节点,日后重现于王度庐、宫白羽的多部武侠小说中。甚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还继承了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金罗汉吕宣良两肩上的一对大鹰,使之变成两只白雕,同样可以自长空急堕,分进合击敌手。这使得“江湖”在彼此的叙述呼应中,成为一个系统的“大历史”。

(二) 对史实元素的收编

范烟桥将“武侠小说”以文类特征分为三种,除去向壁虚构的剑仙斗法一类之外:“一种是结合史事或民间传说,专写拳棒技击的,叙述较合理,不涉怪力乱神,多是敷陈些双方战斗之事,或各派武术家之间因意气之争,而引起的私斗,或官府、镖师与绿林的矛盾等故事;第二种虽也结合一些史事,专写武术,不掺杂神仙飞剑无稽之谈,但所写的武技内容,不尽合理,出现了掌风可以伤人、咳唾可以制敌等等超人的神技,以及宝刀宝剑之类的神奇,故事的背景虽仍是人世社会,但已逐渐失去现实的色彩。”^[11]

1923年,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在《侦探世界》连载。该书以谭嗣同“血谏”为始,以宣统元年(1909年)霍元甲去世告终,“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12]。以致近90年后的研究者亦称:“不肖生是要以霍家的‘迷踪拳’作为他渲染的主干,带出清末武林各门派之看家特色,为武林留下一代英豪的列传。”^[13]

同期赵焕亭《奇侠精忠传·自序》称:“取有清乾嘉间苗乱、教匪乱、回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干,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但其中千年灵芝幻化人形之后服之可增进功力的描写,以及众多女英雄叱咤江湖如白莲教女首领田红英等描写,恰恰说明这部小说着重的不是“言皆有物”,而是“事近无稽”。姚民哀写“会党”武侠小说同样声称:“被我探访确得实的秘党历史,以及过去、现在的人物的大略状况,也着实不少。……倘经一位大小说家联缀在一起,著成一部洋洋洒洒的宏篇巨著,可以称为柔肠侠骨,可泣可歌,足有令人一看的价值。如今出自在

下笔头,可怜我学术荒落,少读少做,故此行文布局,多呆笨得很。只得有一句记一句,不会渲染烘托,引人入胜,使全国爱看小说诸君,尽皆注意一顾。清夜扪心,非常内疚,有负这许多大好材料的。”^[14]

宫白羽《偷拳》将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蝉及其学武经历拉入小说,再到梁羽生最得意的“忠于历史的武侠小说”^[15]《萍踪侠影》,更甚者则为金庸笔下通篇建立在乾隆为陈世倌之子历史假说基础上的《书剑恩仇录》,以及金庸笔下“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的《鹿鼎记》等,共同特点是并不在真实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上用力,“真实”的历史成为“江湖”大叙述夹缝中的“世界”。

征用现实的“历史”知识,妙处在于通过对“时间”节点以及当时历史大事件的锚定,让关于“当时”的全部历史都可以成为符号接受过程中的想象物,这个想象物在读者开始符号接受时,就可以活跃于对此“历史”节点有所了解的读者的想象之中。而在它的侠客谱系建构中,“江湖”虚拟世界成为由各种虚构个体呈现的各种可能世界的集合,无论人物即侠客的私人世界,还是作者或叙述者所表现的“文本实在世界”的其他可能状态,通过一定的因果条件勾连,在明确的“时间链”推移中,多人物视角及直接引语方式以及用力于对叙述时间的明晰化,同样都是为了加深江湖虚构世界客观纪实印象。如同以下两种武侠小说中常用的叙述方法:

这部书将要叙入霍俊清的正传,就不能不且把鼻子李的历史略提一提。^{[9]上册,第6回,p38}

如今暂不言曹、巴二人,在店里很焦急的等候齐四回来,且先将齐四的来头履历表白一番,看官们才不至看了纳闷。因为前几回书中,金陵齐四突然出面,并不曾把齐四的来历,交代一言半语,看官们必然要疑心是作者随手拈来的人物,其实不然。金陵齐四在这部游侠传中,很是个重要角色,前几回书因是曹仁辅的正传,所以不能交代齐四的履历。^{[9]上册,第34回,p226-227}

前者为提前叙述,以维持时间的线性结构;后者为倒叙,在情节线索交叉时,一是交代英雄来历,避免“看官们必然要疑心是作者随手拈来的人物”,对“纪实性”进行声明;二是趁曹、巴二人“在店里很焦急的等候”的空档,表白他人履历,保证叙述时间的整饬性。虽然打破“历史”的自然时间顺序,但它的时间链条清晰,依然可以使叙述安妥在那个“纪实性”的“可能世界”。

如上所述,一靠征用现实世界的“历史”节点,二靠建立侠客谱系,既可使武侠小说情节沿着以某几位侠客为中心的单向“史实”发展,又使这条单向发展的情节线上容纳众多人物活动,以求“还原”错综复杂的“历史”,在“纪实性”与虚构性之间建立平衡。以此种种打着史传的旗号,向“写实”交纳离奇的故事,构成为“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形成一种“隐性叙事进程”^[16],由此构成 20 世纪武侠小说叙事的隐性逻辑。

四、一个分裂的“自我”:“求实”与虚妄的托词

总体而言,“求实”是 20 世纪武侠虚构中一直存在着的假想。究其原因,需要将 20 世纪武侠小说置于中国文学总体环境中,才能探知在幻想中“纪实”的幻觉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武侠小说中一脉相承,既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地位有关,也与 20 世纪的文化大环境有关。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类层级中,“史书是中国文化文类等级最高的叙述文类。‘六经皆史’,按这说法,史书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文本类型,即所谓‘经典化文本’(canonized texts),接近许多文化中宗教典籍的地位。史书的绝对意义地位对中国文化的一切文化都产生压力”^[17],于是,小说之类在中国文类等级中地位低的文类,往往被迫需要向“史”进行超文类的模仿,“对某种高级文类的企慕最后成为这种文类中一种必要的表意范型,用以在这文化中取得存在的资格”^[17],武侠小说作为小说文类的最底层,更需要“慕史”以获得生存空间。

其次,晚清开始的“新小说”运动赋予小说以“新道德”以至“新人格”的社会责任。对于武侠小说此种不叙述“当时”“当地”的幻想文类而言,不得不选择变相“求实”而更加“慕史”。从平江不肖生到金庸等人的武侠作品中,选择以“传”“记”等命名的比例极大。

小说虚构的世界,始终是实在世界、可能世界与不可能世界的交叉物,这使得武侠小说的江湖虚构世界并非抽象的逻辑建构,而是能够被现象感知的某种空间与实体。《儒林外史》以伪侠张铁臂以及凤四老爹(以侠客甘凤池为原型)、萧云仙等“现实”中不得志的侠客,解构明清侠义小说中的诗性叙事,显示了当侠客企图与现实并轨之时,也就是侠客开始落落寡欢于平庸人间的开始。这显示了侠客作为武侠小说中“侠”与“武”的承载主体,需要在虚构中才能寻找到“拯救”的自由。由此,武侠小说徘徊在虚构性与“纪实性”之间,征用实在世界的部分知识,以及建构使侠客“活过”假象的谱系,“求实补史”的旨趣与写实的现实性需求,给“侠客”的幻想虚构带来叙事矛盾。在“虚构性”与“历史性”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它必须努力寻求微妙的平衡。

“虚构性”赋予小说远高于“历史性”的自由度,也在武侠小说叙述中发挥效用。尽管武侠小说总是将时间锚定在中国的“现代”之前,但它们又都刻意与“现代”之前社会拉开距离,提供与实在世界的“历史”间离的可能世界。最关键处是将暴力权“下放”至民间。它既与政治若即若离,免于“当时现实”式的统摄、服务于“一大僚”,又避开侠义公案小说在名臣大官总领之下除盗平叛的套路,彰显民间的个人英雄,组织私人社团,实践民间正义。此间,民间色彩上升,而家国意识淡化,与“庙堂”渐行渐远,文人武官、盗贼乞丐、和尚道士、皇亲贵族以至聂隐娘、红线、练霓裳等女中豪杰,都可以浪迹“江湖”世界而作侠客。且不说作为个体本分的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即使涉及到“反清复明”、夷夏之争、反抗异族侵略等宏大叙事的主题,捍卫民族大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大多出于纯民间的个人自发行为,金庸《射雕英雄传》中守襄阳之役,当时襄阳有最高长官吕文德,郭靖助守襄阳,非受朝廷委托,身处幕后却是真正的主角。在喜欢将历史背景引入武侠小说的朱贞木、梁羽生等人笔下也都莫不如此。20世纪武侠小说总体说来是避开“当时现实”的“伪历史小说”。

由此,武侠小说总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推入一个尴尬处境。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叙述完“张汶祥刺马”之后,就“不高兴再写延长写下去了”,不仅因为那个“取材大率事实”的昆仑与崆峒“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更由于“张汶祥刺马”这个真正有据可考的材料,与虚构的昆仑、崆峒谱系不相容。

与此相类,朱贞木的《七杀碑》同样要在“历史性”与“虚构性”之间博弈。在其序言中,有对本书“纪实”的详细解释:偶得的署名“花溪渔隐”的诗册中,《七杀碑》为其中所记载的明朝轶事十余则之一,讲述张献忠踞蜀时的七雄传奇:“其文分叙七雄事迹,诡奇可喜,杨展为七雄之魁,叙其生平及率义兵规复川南事尤详,谓杨展能识金银气,擅奇门五遁术,近于小说家言。然其叙述,均有所本,吴梅村《鹿樵纪闻》及彭遵泗《蜀碧》等书,所载杨展传中,亦有精五行遁术语,顾博雅之士,亦不免也,岂世真有此神奇之术欤?……余摭拾‘花溪渔隐’所述,兼采各家笔乘,故老传闻,综合七雄事迹,演为说部,而删其怪诞不经者,并据‘花溪渔隐’之说,以《七杀碑》名书,志其所由起。”^[18]对轶事“近于小说家言”的“神奇之术”表示疑问,代之以“删其怪诞不经者”的小说《七杀碑》,俨然要将其改编成一部历史小说。据此,有学者称,朱贞木的《七杀碑》使武侠小说历史化,是一次“学科的融合”^[19]。但事实上,《七杀碑》为了不让写实空间对虚拟空间造成挤压,只将叙述控制在七雄之一杨展赴京回川时遭遇的一系列奇事,根本没有涉及七雄“联袂奋臂,纵横川南,保全至众”对抗张献忠的事迹。这使得其序言或是为小说虚构过甚而做出的平衡之语,或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

此类情况如同俞樾改编《三侠五义》,“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20],志在使“俗说”得以“收编”进入“史传”,却不过“别撰第一回”,之后就难以为继。而金庸等人的小说中,或者采用注释,或者另作别传,都不过是企图将天马行空的虚构拉回小说纪实性“史传传统”的故弄玄虚或无可奈何之举。可以说,这是武侠小说以“写实”的叙述方式为托词支撑一个虚构的世界必然会遭遇的窘态。

由现实人生延伸至中国传统小说之虚构叙事,向来重实际而黜玄想,以“纂史”方式维持文化的意义等级,武侠书写便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左冲右突。由于武侠小说作者大多是被抛入社会底

层的文人,武侠小说的写作以其可以迅速转化为生活资料,成为他们维持生计之器。平江不肖生写了《留东外史》,被世界书局老板看中,稿酬特别丰厚,但出版商要的是剑仙侠士之类传奇小说,于是有了《江湖奇侠传》的诞生。但矛盾在于,武侠小说既要在“纪实性”中获得意义等级下的生存空间,又要在“虚构性”中完成“侠”之拯救神话,“求实”与“虚构”往往彼此成为负担。而在具体叙述中,一方面对“求实”孜孜以求,一方面采取种种策略性搁置,使其成为虚构的一种托词。隐藏在武侠小说叙述背后的作者的分裂“自我”,使其总是在所谓的“纪实”与“虚构”中左冲右突。最终,以“诚实的记录”为名,武侠小说成了一个伟大的“说谎者”。

参考文献:

- [1] Emile Benveniste. The Formal Apparatus of Enunciation[M]//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Coral Gable: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82.
- [2] 孙金燕. 现实、虚构与想象: 武侠文本的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 104-111.
- [3] 吕进, 韩云波. 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J]. 文艺研究, 2002(2): 65-73.
- [4] 张新军. 可能世界叙事学[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80.
- [5] 谭华. 《城邦暴力团》: 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J]. 光明日报, 2011-1-30.
- [6] 胡塞尔. 胡塞尔文集[M]. 倪梁康, 选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858-859.
- [7] 韩云波. 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6): 33-39.
- [8] 韩云波.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2): 127-138.
- [9] 平江不肖生. 江湖奇侠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0] 韩云波. 论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1(2): 42-47.
- [11] 魏绍昌, 编.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313.
- [12] 平江不肖生. 侠义英雄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上册, 第1回, 1.
- [13] 范伯群. 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37-40.
- [14] 姚民哀. 箭帽山王·本书开场的重要报告[J]. 红玫瑰, 1930, 6(1): 7.
- [15] 尤今. 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中[G]//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 香港: 伟青书店, 1980.
- [16] 申丹. “隐性进程”与界面研究: 挑战和机遇[J]. 外国语文, 2013(5): 1-6.
- [17] 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 224.
- [18] 朱贞木. 七杀碑[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 1.
- [19] 汤哲声. 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1): 144-147.
- [20] 俞樾. 序[M]//七侠五义. 北京: 宝文堂书店, 1980: 4.

责任编辑 木云